

中美新闻报道观的不同表征审析

朱 清 河

[摘 要] 中美新闻报道观念有着显著不同,一个恪守“正面宣传”,一个偏爱“负面揭丑”。中美新闻业界学界尽管 30 年来一直试图在弥合这一实践分殊,但结果依然是各自“唯我独尊”、“我行我素”。从历史元素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层面来说,正面宣传揭橥了中国近现代新闻发展的逻辑命脉,即“宣传喉舌”;负面揭丑耦合了美国奉为主臬的媒体政治制衡功能体认,即“第四权力”。中美在新闻报道的功能、题材、真实、客观等方面所存在的这一系列迥异观念,源于各自历史与社会实践,并且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转化。

[关键词] 新闻报道观比较;喉舌宣达;环境监测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9)05-0630-05

新闻报道观是物化的新闻报道实践及其作品在人脑中烙印的刻痕。观念的东西首先来自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经人脑打磨后又规诲人的实践。一方面,共同新闻传播逻辑的衍蔓使得中西新闻报道观念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面相;另一方面,“不同的客观环境和生活实践形成不同的观念,而在不同的观念支配下又会产生不同的生活实践。”^[1](第 67 页)中美不同的历史文明沿革、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生活传统和新闻传播环境建构起不同的新闻报道体制、机制和方法,衍生不同的新闻报道活动,孕育不同的新闻报道观念。在这些新闻报道观念的引领下,又会有相应的新闻报道实践,生产出相应的新闻产品和新闻报道模式,维护和巩固相应的新闻报道体制、机制和方法。

一、新闻报道的功能观——喉舌宣传与耳目监督

中美的新闻实践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各自独特的历史逻辑、文化传统与价值诉求都为自身的面相涂上了风貌迥异的底色。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宣传功能与美国权力制衡功能都通过双方新闻报道整体倾向的比较而得以彰显。中国报刊被称之为“喉舌”,新闻报道的功能被框定在宣达政令、舆论引导上,在监督政治方面作为不够;而美国的媒体则是和行政、立法、司法并立的“第四权力”,新闻报道在监督政治、制衡权力上表现突出。

中国的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就被深深地烙上了“政治”的印迹,其宣达政令的功能一直被传承、沿袭至今。邸报(官报)存在于自唐开元年间至清末的所有朝代,其履行的是“国体尊而民听一”的朝廷喉舌作用;北宋后期,社会矛盾激化产生出非官方编印的小报,但其刊载的内容仍以朝廷政事和宫廷消息为主;明朝后期出现了《京报》,它表面上看是“一种以刊载朝廷官文书为主要内容的可以公开出版发行的民营报纸”^[2](第 27 页),但其合法的原因,也在于封建统治者要利用报房老板的营利心理为自己进行政治宣传。

到了近代,国人自办近代报刊,更以“以言报国”为目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与革命派都充分利用报刊的力量为自己鼓吹。《民报》与《新民丛报》成立双方政见博弈的前沿阵地。梁启超“报馆有益于国事”与孙中山“政治变革的舆论喉舌”的新闻观无不表征着报刊工具理性的内核诉求。梁启超、孙

中山们“政治工具论”的报刊思想甚至为嗣后崛起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之厦轧实了根基。

进入现代社会后,毛泽东确信新闻媒体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新闻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在1942年2月8日的《反对党八股》的讲话中说:“新闻记者是宣传家”,“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1985年,在一次题为“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的讲话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这样阐述: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性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

美国的新闻媒体一直被称为“政府第四部门”,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并对这三个部门的过分行为和不当行为起着监督作用。长久以来,美国新闻媒体通过反映舆论对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进行监督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决定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以及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就是国家权力系统运行机制中的制衡系统。

十七八世纪,美、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发动了一系列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他们纷纷出版报刊,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动员民众推进革命进程。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为了防止政治专制,托马斯·杰弗逊就提出了利用新闻媒介来实现人民对政府的政治监督的主张。不久他又指出:“报刊有责任防止政府越出范围……报刊要对政府提供一种其他机构无法提供的监督作用”,“自由报刊应成为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起监督作用的‘第四权力’”^[3](第79页)。在资产阶级从诞生到执政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起初,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的残酷压制下,希望通过报纸发出自己的声音;待到资产阶级发展成熟在经济领域占据主要地位时,也相应地希望通过办报在政治领域取得同样的地位;执政后的资产阶级又会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统治,而报纸是资产阶级维护统治不可或缺的利器。正是由于权力长期处在落后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中,才需要一种工具来制衡这种权力,报纸无疑是这项功能最好的承担者。

进入垄断阶段后直到今天,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激烈竞争直接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财产占有状况的波动,资产实力的不断星转斗移,必然引起政治权力和地位的重新“洗牌”。新的垄断集团总是寄希望于新的政治代理人,提出一些新的政治主张,实行某些改良,统治阶级需要不断地调节内部矛盾,相互制约,保持均势。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界对政府的监督,有利于垄断集团在政府内部进行权力再分配,使各垄断集团的利益得到协调。“水门事件”的被揭露,就是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行动和意见的范例。

二、新闻报道的题材观——正面为主与负面突出

新闻传媒担负着多重社会角色,但就其本质来说,刊布消息、报道新闻永远是其第一要务和立身之基。新闻应该报道什么内容,什么样的题材才能纳入新闻报道的视野,中美之间却又有大相径庭的遴选尺度。在“宣传喉舌”功能定位下,新闻报道必然走向正面宣传模式,题材也就会以一贯之地框定在正面报道的界域内,“报喜不报忧”,自然就成了中国新闻报道题材观的形象描述,尽管其弊端有目共睹,但“我自岿然不动”;在监测环境、督导政府的新闻理念的浸淫下,美国新闻报道自然会走向负面揭短模式,报道内容也就会框定在负面消息之内,“坏消息才是好新闻”自然也成了美国新闻报道题材观的生动诠释,虽然它也常遭人诟病,可见如今美国新闻报道依然是负面报道之风劲吹。

一般认为,新闻报道按其内容一般分三类,即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中性报道等。负面报道“集中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行为,及像犯罪、丑闻、性攻击、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类似的反常事件”^[4](第49页)。正面报道的旨趣偏向积极与光明面;写作基调是宣传教化和正面赞颂。处在正、负面报道之间的可称之为中性报道。以此番界定来考察每届普利策新闻奖,从1917年到1990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大约有约80%都属于负面报道,其中40%属于揭露性报道,另有40%属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5](第110-111页)。这一统计结果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反映了一种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

其实,对负面消息的大量报道绝不仅仅是普利策奖的独家独爱,展示丑恶、揭露弊端成为美国新闻

报道的主旋律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百年前的“扒粪运动”(Muckin)^[9](第 354 页)。正如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现任执行官西格·基塞勒(Sig Gissler)所言,“战争、灾难、挖掘社会问题、揭露贪污、揭露政府等问题一直是评委喜欢的题材”^[7](第 6 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频道总裁 Michael Gartner 在讨论新闻媒体与公众和社区的关系时更是强调,“报纸的职责是向社区做出解释,而不是召集社区开会;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报纸的职责是揭露坏事。”^[8](第 4 版)

中国式思维惯常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尽管这一事业有时也会有失误和曲折,但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主流总是健康的,光明面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报道历史前进中的英雄主义和前进中的社会主义历史现实是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而暴露和批评则是第二位的。”^[9](第 5 页)

新闻贵在打气鼓劲,即使负面消息,我们也要挖掘出积极意义从正面进行报道,“对于党的新闻舆论工具来说,讴歌好的和批判坏的,正面宣传和揭露问题,哪个为主?哪个为次?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揭露性的报道太多,反映阴暗面的内容太过突出,让人看了不但不能提高信心,反而产生一种灰色的、失望的情绪,那就是我们的失职”^[10](第 442 页)。我国“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观大大地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展示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光辉形象。但反过来,由于受众在接触新闻所提供的有关如天灾人祸的负面消息报道时,只能了解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官民光鲜形象,灾情、民怨、官渎等“阴暗面”则被大量的“正面报道”所淹没。最能说明此问题的一个例子是 1976 年 7 月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报道。震后 3 天的 8 月 1 日,第一篇有关地震消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军民大力支援下,唐山灾区人民以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英勇抗震救灾》以鼓励、颂扬式的正面报道面目在《人民日报》刊出,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只字不提。

三、新闻报道的真实观——本质真实与具体真实

真实性原则,是新闻报道与其他形式的文字作品相比所独有的不可或缺的特质与安身立命的凭藉,可谓全球的新闻业的“金科玉律”,当然更统摄整个中美新闻报道领域。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是一个合格的新闻从业人员应该首先具备的品德。中美两国新闻人都认为:构成新闻要素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真实可靠;新闻引用的各种资料,如背景材料,引用的数字、史实、语录都必须确切无误;新闻的观点、认识的高度、事物发展的程度,都要按照实际情况,不偏不倚。中美两国新闻界在对待报道失实的错误时,同样都指出了要主动承担责任,及时更正。美国新闻媒介更是将更正错误看作是新闻媒介的权利和义务。

新闻真实是一个复杂的命题。从哲学角度看,真实包括三重基本规定:“一指客体世界本身的运动、变化、发展及其规律性。二指认识的真实性、真理性。在这重含义上当人的认识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时即谓‘真’,否则即谓‘假’。三指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的思想和行为达到了与规律性的高度一致”^[11](第 53 页)。第一重真实性可以看作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真实,说的是事实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第二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实,反映的真实乃是主观与客观的一种符合关系;第三重则侧重于实践活动的真实,追求认识与存在的现实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追求真实所体现的善和美的境界。

作为反映、报道现实世界最新变动状况的新闻活动,本质上属于认识活动,形成的新闻报道是一种认识结果,所以新闻真实的要义在于认识论意义的真实,并以存在论意义的真实为前提。

既然新闻的真实性本质上属于人的认识活动,那么具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中美双方的新闻从业者自然对新闻真实性的表现层次和实现条件的理解和把握出现较大分歧。

一般说来,美方只关心微观与局部,他们追求的只是事实真相是否被无误掘出,“记者好像是一个勘探家,他要挖掘、钻探事实真相这个矿藏,没有人会满意那些表面的材料……只要有可能,记者就应该坚持到底,直到新闻的矿藏——事实真相——被挖出来为止”^[12](第 144 页)。中方则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始终处于一种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转之中,这个国家从整体上说积极向上的一面就会大于阴暗消极的一面,所以新闻真实除了要求微观上的每个具体事实准确无误外,更要求对宏观上的社会现实状况有全面的把握和反映即局部现象之真实要服从于整体和本质之真实,真实不仅表现在微观的具体新闻事实

的报道中,更应体现在宏观本质的整体把握上,比较经典的表述就是,“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不仅要求对所写的事例、人名、地名、世间、数字、引语准确无误,而且要求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13](第13页)。

四、新闻报道的客观观——表述一致与理解各异

在新闻报道观中,关于“客观性”问题又是中美间一大既拥有共识又存在异议的地带。正如我国大陆学者李良荣教授在《中国报纸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探讨的那样,“中西方对客观报道有不同的理解。在西方,‘客观报道是指新闻报道的内容,不是方法。客观报道意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在中国,‘客观报道成为宣传的特殊方法’,‘从理论到实践,中国的报界把客观报道当作宣传方法来看,以客观的外表掩饰主观的宣传动机’”^[14](第51页)。

众所周知,19世纪以来,美国报业奉行客观报道的原则,反对记者介入新闻叙事,主张新闻只记录事实,报之客观,远离“宣传”(propaganda),撇清“党见派性”(partisanship)。即所谓“只报道事实,不报道意见”。1835年,班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在《纽约先驱报》(The New York Herald)的创刊号上宣称:“我们将致力于纪录事实,纪录公共的和主要的事件与问题。我们不说废话、不带偏见、公正地、独立地、无畏地和善意地进行报道”^[15](第64页),这似乎可以作为美国新闻报道中客观性原则的早期宣言,事实上,它也长期被美国新闻界奉为主臬。为确保客观性原则得以全面贯彻,他们甚至制定了“导语中简述基本事实、以第三人称进行报道、引述当事人的原话、强调可以证实的事实、不采取立场、至少表述新闻故事的两面”^[16](第71页)等具体操作规范。

我国大陆学者一般认为,新闻具有客观性,但同时认为新闻更具有倾向性,并认为新闻的倾向性与客观性并不矛盾,“因为倾向性是记者通过新闻事实,暴露出来的思想趋向,而不是随意作主观的解释和议论”^[17](第62页)。

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大众传媒是执政党和国家拥有与直接管理的特殊机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认为自己代表与服务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不挟任何私利,自然不惧声明倾向性,更声明治下媒体务必坚守党性原则,无条件地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这就公开表明了媒介的倾向性,即作为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的基本属性。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媒介市场化、产业化的推进,新闻媒介一方面继续在大政方针上反映执政党和政府的意志,一方面努力淡化宣传色彩,更多地以日益分化的受众需要为着眼点,提出了倾向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观点。尽管如此,在这方面与西方新闻界仍然有重大歧异。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界是坚决反对媒介的倾向性的,认为倾向性是“偏见”(bias)和“成见”(prejudice)的同义语,有悖于客观公正的新闻精神,一旦这种倾向性被定为一尊,民主与自由的前提不复存在,因为他们认为媒介承担着“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的特殊功能,而这种信息必须是多元的和具有高度的公开性。

根据西方主流政治理论“民主多元论”,社会中包含着许多利益冲突的群体,新闻媒介应广泛反映各种利益群体的声音,而不是一党一派的传声筒,惟有“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才能满足公众的不同要求。在媒介运作中,美国新闻界奉行报道事实和发表意见分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将新闻部门和评论部分立。新闻被视为公共财富,报纸的新闻栏目属于公众,而不能贩卖业主或主编等“把关人”的私货;社论版则是业主和主编的领地。

回溯往昔,解析当下,设若厘定新闻报道观的支撑性核心理念,恐怕中方非“喉舌宣达”莫属,而美方则“耳目监测”当仁不让。尽管支撑这种局面的隐在或显在基石依然“坚挺”,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世界思想文化主潮的跨文化掘进,传播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与构建和谐世界共识的拓展,中美新闻报道观念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机遇已经到来。

[参 考 文 献]

- [1] 童 兵:《比较新闻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2] 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3] 刘国瑛:《新闻传媒——制衡美国的第四权力》,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 [4] 张 威:《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载《国际新闻界》1999 年第 1 期。
- [5] [美] 道格拉斯·贝茨:《美国普利策奖金内幕》,贾宗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 [6] 车 英:《从调查性报道与新闻自由的关系探析〈赫顿报告〉的实质》,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
- [7] 刘 莉:《普利策奖强调新闻为公众服务》,载《东方早报》2005 年 6 月 6 日。
- [8] Romano, Carlin. 2000. "Who Owns the Fourth Estate," *Nation* 270(3).
- [9] 李瑞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载《求是》1990 年第 5 期。
- [10] 穆 青:《新闻散论》,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6 年版。
- [11] 周文彰:《狡黠的心灵——主体认识图式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 [12] [美] 麦尔文·曼切尔:《新闻写作与报道》,艾丰等译,北京:广播出版社 1981 年版。
- [13] 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14] 芮必峰、姜 红:《新闻报道方式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15] 张隆栋、傅显明:《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16] 展 江:《媒介评论三题》,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
- [17] 刘建明:《客观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责任编辑 车 英)

A Deep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s of Ideas on News-Reportag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Zhu Qingh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deas on news-reportag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re very different, one carefully obey "positive publicity", the other is partial to "the negative report", though having tried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past thirty years. In view of the history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ositive publicity matches the logic of journalistic development in China, namely "publicity mouthpiece"; the negative exposure matches journalistic experience in America, namely "the fourth power". A series of different ideas on news-reportage, such as function, topic, reality, objectivity that come from their own social practices, will change with the ages developing.

Key words: comparison of journalism ideas; mouthpiece of propaganda; environment-monitor